

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高度

□韩永进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发表的关于文化和文艺工作一系列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对新时期文艺发展繁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系统的回答,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回答了新时期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党对于文艺工作高度重视,对于文艺的作用高度重视,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提出,在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崇高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文艺工作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习近平在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和方向。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认识到,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习近平在不断深化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第一次明确响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

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毛泽东早在新中国即将建立时,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更多的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又明确文艺要“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文艺要实现‘蓬勃繁荣、争奇斗艳’”。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一流优秀作品。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了当今的文艺问题,在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文艺本质是人民的文艺基础上,提出文艺与人民关系的一系列具体论断,强调“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要把握人民需求,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人民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创作生产具有特殊复杂性,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等多重属性。如何处理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大课题。早在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针对曾出现的把票房、收视率、码洋、点击率、吸引眼球等作为文艺作品的惟一评判标准,市场作为文艺作品惟一追求的现象,明确提出了“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回答了什么是精品和如何创作生产出精品。针对当今文艺创作方面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习近平特别强调了精品的作用:“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精品”的标准:“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是书写和记录人民伟大实践、时代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是“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之风”的精品;是“让人心动,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的作品;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作品。习近平还提出创作生产文艺精品的路径:“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宽松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供不同观点和学术派别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习近平还特别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永恒价值”。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回答了如何加强文艺评论。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文艺评论的指导与促进。文艺评论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探索文艺规律和促进文艺繁荣上,在推荐优秀作品上,在批评错误文艺倾向上都有其独特的作用。文艺评论还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区分真善美与假恶丑,优秀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的文艺评论是相辅相成的。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里,习近平强调了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开展评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理论中,“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是文艺评论的最高标准,但又具有具体的发挥。

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继承与借鉴等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历史进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直是我们的重大课题。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还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又强调:“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习近平结合新实践,进一步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要结合新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与此同时,“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

回答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习近平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刻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静下心来,精益求精创作,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文化工作者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要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回答了党如何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积极探索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我们认识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艺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艺事业,提高艺术水平,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优秀作品。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良好生动局面。”这从实际上回答了如何才能胜任党的文艺领导和如何才能做好党的文艺领导问题。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馆长)

青年导演峰会关注新锐电影人

本报讯(记者 王觅)日前,由中国影协、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办的第九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系列活动之“我的电影观——青年导演峰会2014”在京举行。此次峰会全面展现了青年导演的电影梦想,旨在推动新锐电影人的成长和發展。

峰会上,李睿珺、徐昂、杨南倩、金琛4位参展青年导演作为主讲嘉宾,分享了各自的电影观念和创作得失。他们表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应该坚持自己最初的纯然之心、善良之心,坚持艺术理想,保持作品的品格,同时不断从哲学、社会学等多个维度吸收养分,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电影创作。青年导演们还围绕“我的电影观”、“2014年的还艺术现象观察”、“电影市场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今后电影创作展望”等话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电影《黄克功案件》聚焦“依法治国”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由王兴东编剧、王放放导演,王凯、成泰燊主演的电影《黄克功案件》将于12月4日在全国上映,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与观众见面,是因为这天是国家宪法日,影片正是通过再现抗战时期的大案要案突出了“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题。

《黄克功案件》的剧本刊发于《中国作家·影视》2011年第9期。影片再现了发生于1937年的“黄克功事件”。编剧王兴东表示,把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呈现在大荧幕上并不容易,虽是历史,但很多人并不了解,因此既要创新,又要严谨,既要符合时代发展规律,又要真实可信。他希望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影片《黄克功案件》能为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治军提供一面历史之镜。

“80后”导演王放放通过影片诠释了新一代电影人对“主旋律”影片的理解:抛弃一边倒的高大全形象,注重人物内心刻画,让“新主流大片”唱响“新主旋律”。他说,主旋律电影并不难拍,有故事性、人性,就能被观众接受,就是好电影。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概括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指明了我们所面临时代文艺工作的方向,中心点是强调人民引领文艺,文艺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写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精品来,“文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不能一味讲票房价值,“要以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写出“中国精神”来,以健康向上的感情感染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样的文艺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家才“大有可为”。这些都十分重要。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到文艺工作中。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在讲话中,不时强调文艺要实行百花齐放的政策,尊重和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佳作精品来,让人们真正地得到精神的享受。我的这篇短文是专就习总书记的讲话的后一点,即文艺创作的规律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般而言,文艺创作的规律可以分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所谓外部规律是指文艺的外部对文艺创作必然的要求,所谓内部规律是指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要求,下文分四点,第一点谈外部规律,第二、三、四点谈内部规律。

1、文艺之新 文艺创作要创新,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目标呢?这就要使文艺具有时代精神。习近平的讲话许多地方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挥和发展,惟有人切入点是不同的。当年毛泽东讲话的切入点是抗日战争,其中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把文艺当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这种“文艺武器”论,在那个时代是对的。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文艺是文艺,怎么会变成武器呢?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如果不积极抗日,国家民族灭亡了,你个人也作了亡国奴,你还能在这个世界立足吗?所以那时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文艺家手中只有笔,那么你就用你的笔去打敌人。如何才能对付敌人呢,你又不是拿枪上前线,那么你就在后方用自己的笔,写出有中国人的骨气和血性的作品来,特别要用它们与敌人作战、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消灭敌人的高涨的革命热情和精神,来为工农兵服务,不要总是抒发知识分子个人的感情,这样文艺作品才能与工农兵读者所接受和亲近,为工农兵读者所喜闻乐见,如果这样做了,自己手中的笔岂不与解救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吗?文艺也就这样有了时代精神。

习总书记讲话的切入点是今天的中国现实。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30余年间,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迅速的发展,国家强盛了,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我们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要继续改革开放。所以习总书记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因此,习总书记的讲话是有时代感现实感和针对性的,讲话“旧中有新”,新的现实,新的表述,新的发展,体现伟大时代的新的要求,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又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也。”接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总结了文章“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状态,以此证明文学与时代俱进,时代引导着文学的变化,时代对文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渗透作用,这作为一条文学规律是很有说服力的。我记得一次去岳阳楼参观,未见岳阳楼上最高一层悬挂着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写的是杜甫名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我站在那里想,这句诗外表显然写晚年杜甫自身不幸的遭际,深一层则写“盛唐时代”已过,诗人的命运才落得如此不幸。杜甫后来坐在江回到离故乡不远的江南后,未找到侄儿,只好住在长江边上的小船上。杜甫登岳阳楼,写下了包括上面毛泽东书法作品所写句子的《登岳阳楼》诗篇,他以自己晚年不幸命运的抒写,来暗暗预告多事之秋的中晚唐时代的低沉转折。这和王维、王昌龄、李白、杜甫等青年时代写喝酒、醉酒、山川美景、守边征战、建功立业的盛唐时代在时代精神上是完全不同的。

文艺家创作总是面对自己的时代说话,世界上没有那种与时代完全隔绝的文艺家。即使你写的不是现实的面貌,古今如此,中外如此,概无例外,这就是文艺创作的规律之一。

文艺的时代精神不是纯粹的口号和教条。文艺的题材是无比广阔的,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言情与记事,写景与抒情,甚至风花雪月,花鸟鱼虫,无不可写。文艺要有主旋律,但也要有主旋律的变调,还要有和鸣相辅之音,所以不要把文艺家的时代性与文艺题材的广阔性对立起来。

2、文艺之根 “根”树之根也,延伸为“根本”。文艺的根本是什么?是生活,特别是人民的生活。习总书记说文艺家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就道出了文艺创作的另一条规律。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如何才能获得创作的源泉呢?这就要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是文艺家最基本的功。观察生活,重在积累。古人云:“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左传》云),那么这“感”是“感”什么呢?当然是感觉生活,即观察生活。观察生活是创作的起步阶段,接着是要不断观察,不断积累,积累到心中满满的,就像那水缸满到水溢出来了,才可以拿起笔来。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语)。对于观察生活,还可简要说一点,那就是文艺家的观察要达到细致入微、毫发无遗的地步。宋代大文豪苏轼提出“观物要善”的看法,他在评论一位画家的作品时说:“黄荥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书黄荥画记》)如果我们读了这段评论,那么苏轼所谓的“审”的意思就是精审、仔细、周密、准确,不是想当然。观察细致入微的例子,则可举杜甫诗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为什么不下雨或下大雨的时候,鱼儿不会亲身向上并张开嘴呢?这是因为在下雨,水面平静,鱼儿亲身向上干什么啊!而下雨大雨则水面波浪起伏过大,鱼儿会觉得有什么危险在等待它,它又不傻,才不会亲身向上呢!只有下“细雨”的时候,鱼儿才会觉得上面似乎有食物掉下来,才

尊重和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

□董庆炳

会纷纷地把头伸到水面,并张开嘴或跃身跳起呢!燕子在大风或无风中,它的翅膀是不会抖动而倾斜的,只有在“微风”中,燕子才会抖动和倾斜着自己的翅膀愉快地游戏玩耍。我本人来自农村,小时候与花鸟、溪水、和风雷为伴,杜甫所写的场面是我亲历亲见,也是所有农村人亲历亲见,可以证明诗人对事物的观察细致入微,道出了我们想“道”又“道不出”、“道不美”的情景。

对于文艺家来说,只有观察生活是不够的。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个“扎”字,值得细细体味,一个“扎”字,不仅仅包含对生活的观察而已,还必须包含对生活,特别是对人民生活的体验。“体验”是文学创作的关键环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提出了“蓄愤”说和“郁陶”说,认为那些汉代和现代的词赋家,缺乏对事物的反复体验,“心非郁陶”,一味铺陈,所以“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是“为文而造情”;真正的诗人则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这才是“为情而造文”,理解了创作的秘密。体验与经验是不同的。经验是说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有点像人生的流水账。“体验”是把自己观察到的事情,放在心中长久“蓄愤”(即蓄积情感),反复体味、酝酿、沉思。一个少女失恋,在刚刚发生的时候,感到痛不欲生,这是自然感情,这时候她不会拿起笔来写诗文的,等到她再次恋爱,得到幸福之后,她平静下来再回首往事,她觉得不知不觉中那次的失恋已经变成一个故事,诗意油然而生,她就会试图拿起笔来。因为这时候,她的痛苦的感情进入体验,再体验的过程,那种痛苦感情“蓄愤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李贽:《杂说》)。体验、再体验的功能在于诗思蓄积、情感回忆、深度思考。刘勰的“蓄愤”说和“郁陶”说,可以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沉思”、苏夫·托尔索泰的“再度体验”说和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的“非征兆性情感”说相媲美。这样说来,“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就要持久浸泡在人民生活之中,进入长期的体验中,不是见了就写,听了就唱,要在再度“体验”中,“蓄愤”中,“沉思”中,“郁陶”中,才能化自然感情为诗思感情,才能做到“势不能遏”,“满而作”。

3、文艺之理 这里的“理”不是一般道理的“理”,它是指与理性、灵魂、精神有关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文艺要表现“中国精神”的概念,他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的灵魂,没有精神,将情无所附,魂无依归,没有精神,一个民族只能是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的一盘散沙。”我们给世界讲中国故事,不能停留在举一些事例上,也不能停留在举一些发展的数字上,一定要进入人表现“中国精神”的层面上。文艺创作在这点上就有很大的优势,就是说文艺创作还有条规律,就是要追求文艺之理,即事物内在精神世界的深邃。文艺家在观察和体验生活之后,进入了艺术想象和构思的过程。艺术想象和构思,不仅要做到“以物观物”(刘勰《诠赋》篇),做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神思》篇),而且还要研究生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通过个别表现一般,深入到理性的精神层面。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所指,皆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这里所说的“主”即“意”,所谓“意为主”也。这“意”指情意,即带着情感和诗意的精神、灵魂。意是诗文的主帅,一切都要围绕着他,可它不在可见的战壕里,在看不见的指挥部。亚里斯多德把这“意”称为“哲学意味”(《诗学》)。意思是它并非说出来的哲学话语本身,它是隐含在悲剧境界中最深层的精神,因此它是一种哲学的“意味”。文艺之理就是这“以意为主”的意,就是这寓含在意象体系之中的“哲学意味”。

为什么说文意之“意”或“哲学”是可体味而不可目视的呢?这是因为文艺之“理”是从“意象”中流露出来的。不要在文艺作品中喊口号,发议论,重要的是通过“神思”去经营“意象”。刘勰说:文艺家如“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思》)。意思是说,有独到见解的匠人,看着心中已经完成了的完整的“意象”,才运用斧子这些工具开始干活。意或哲学意味作为作品的灵魂,就在“意象”中,如果把把“意象”描画传达出来,那么,这作品就会有“理”,即描写艺术形象的深入骨髓的精神,这是优秀作品的最深层次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这句诗有“顽强”、“坚持”、“坚韧”、“生命力”这些词语吗?没有,但我们读了这首诗后,读者自己就会通过对“野草”意象的体味,自然地与这些表达人的精神品格词语联系起来。

4、文艺之技 文艺之技就是各类艺术品创作中的艺术技巧。如何结构故事交际人物关系,如何运用辞采章句等(文学),如何安排情节制造高潮经营结尾(戏剧),如何运用节奏、音调等(音乐),如何运用身段、手足动作等(舞蹈),各种艺术专业的专家都有精深的研究。限于篇幅,这里想简要地说说,文艺之技为什么也是文艺创作的规律呢?这是因为任何艺术都要讲美和质量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的作品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艺作品的质量和美,与许多方面有关,其中也与“艺术训练”有关,与技巧的高下有关。生活本身不是艺术,艺术是对生活的艺术提炼与艺术加工。谁不能在草坪上或树林间,叼着雪茄或香烟的时候,构思出一两个故事来呢?人人都有故事,但不是人人都是作家。作家讲故事是要艺术技巧的,通过长期的艺术训练,艺术技巧日臻成熟,才能写好故事。你心中有中国故事,但离写出小说来,还有很长的距离。

毛泽东的《讲话》讲到了生活与艺术的不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六个“更”,有些是举例来说的,我们不必把它固定化,自己可以补充,如“更平淡,更萧散,更简练,更自然,更含蓄,更湿润,更绚烂”等,杀人的场面很强烈,太刺激人,为何不可更平淡更萧散一些呢?有的作品写“性”,太集中,太暴露,为何不可写得更含蓄更有艺术韵味一些呢?艺术技巧可以创造,不是死的东西。从此可以看出文艺之技作为规律,也是纷繁复杂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思想精深,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可以理解为提高艺术技巧的诸多方面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军军之城》：湘西大地的生命之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说起凤凰,许多人会觉得它是美丽而神秘的,但对当地人来说,凤凰却充满了血与火的历史记忆,感应着近代中国历史的云谲波诡。抒写湘西大地上的生命之歌,是作家刘箫在她新出版的长篇小說《军军之城》里的尝试。日前,长篇小说《军军之城》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焜明,以及雷达、胡平、贺绍俊、彭学明、何向阳、顾建平等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主办。

《军军之城》通过匡氏一家四代人的命运串联起“边城”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历史变迁,展现了这座“边城”男子勇武、女子多情的生命场景及奇谲瑰丽的悲情命运。与会者认为,这部小说的题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写湘西不止于写美丽的风景和浪漫的生活,也表现了湘西文化中刚猛决绝的一面。作品写出了一种有呼吸、有温度的历史,渗透着作家本人对历史的认知和情感判断。此外,小说融入了大量充满传奇色彩的民俗风情描写,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作者不仅写人物命运,而且将众多事象、物象、历史、地理、魔法、巫术安排在文字的经纬之中,这些在赋予小说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同时,也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命内核。

大家还谈到,《军军之城》在艺术上有疏漏之处,比如历史材料融入文学叙事,小说节奏的控制和把握方面有待提高。作者需要更深入地去了解湘西的历史文化,关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现实,探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存与命运。